

孔子何以被尊稱爲萬世師表？

陳立夫

一、前言

聖大副校長薛光前博士邀我來貴校作專題講演，這是第二次，第一次在四年前，題目是「中西文化之異同」*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Confrontation or Conciliation*。這次我何以要選這樣一個題目為諸君講述？是因為孔子的偉大，雖在兩三世紀前早已為歐洲各國的大學家所認識和推崇，但是由於文字的隔閡，以及中國曾被全世界所有帝國主義者所欺凌，成爲他們的共同殖民地幾達一世紀之久，她的崇高偉大的文化，自然不被世人所重視，因此這一文化的重心——孔子思想，亦就默默無聞了。自從國父孫中山先生以三民主義領導中國革命，喚起全民，對內推翻了滿清的專制腐敗政權，於一九一二年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對外主張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以要求列強取消以往強迫中國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俾中國重獲自由與平等。他的願望，在他逝世後二十餘年中，蔣總統一一爲實現。中山先生自己承認在文化方面，他是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傳的道統，因此孔子之道跟着中國的復興而日益顯著，並被公認爲三民主義的源泉。今日在臺灣所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一方面要從根救起中國固有的道德智能，亦就是孔子的倫理思想及民本思想；另一方面要迎頭趕上西方的物質科學，亦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與科學技術。諸君或許還記得故國務卿杜勒斯，在宣布中美協防條約時，亦以保衛中國文化爲其最重要的理由。因爲他曾居住中國較久，的確了解及愛好以孔子思想爲中心的中國文化，而具有遠大的眼光者，他預先料到毛共終將毀棄中國文化而代之以落後的馬列主義文化，以暴力強迫中國人民來擁護他們的漢奸行

爲而不以爲耻，後來之文化大革命，以及批孔揚秦，都是必然的演變結果。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凡誕生了一位偉大的聖哲，莫不引爲極大的光榮，他的言行，人人傳誦，作爲模楷；他的遺物，妥爲保存，供人追念；因爲他創造了歷史文化，成爲國家民族的靈魂，其意義及影響非常重大。所以有人問大政治家英相邱吉爾說：「如果英國屬地印度與莎士比亞二者，任你選擇其一，你將何選？」邱毫不猶豫地答道「莎士比亞」，因爲莎氏的思想，足以代表英國，而且他的出類拔萃的文藝天才，永久是英國的光榮。惟獨毛共才願出賣自己民族的靈魂，爲蘇俄侵華作鋪路的先鋒，而復畏懼蘇俄之來侵，其愚眞不可及，其罪眞不可逭。

中國政府於一九三九年八月（即對日抗戰第三年）曾接受我之建議（其時我任教育部長），以孔子誕辰爲教師節，施行迄今已六年矣。不料於一九七〇年五月廿八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之聖荷西（San Jose）市市長接受了當地華僑劉國能君（Frank G. Lowe）之建議，提經議會通過，宣布每年九月廿八日孔子誕辰爲該市教師節，山打卡拉郡（Country of Saint Clara）亦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七日通過採取同樣的紀念節，隨而加利福尼亞州議會亦通過此案，因之全州亦有了孔子誕辰之教師節日。同年（一九七一年）八月三日美國衆議院又通過同樣之議案，若再經參議院通過，即將成爲美國的法案，孔子爲全人類謀和平幸福之苦心，將可在西半球所有教師及人民的心目中漸漸了解，並將使中美兩國文化之交流，更可邁進一大步。中華民國孔孟學會（我爲現任理事長）於去年七月贈送了一座卅英尺高的孔子銅像及大理石像座給聖荷西市政府，現已矗立於止在該市中心區建造之中國文化公園中，以紀念孔子思想在美國的發祥地。諸

君如有機會去西岸，望勿失去瞻仰此一孔子像的大好機會！

美國現代歷史哲學大家杜蘭博士(Dr. Will Durant)對孔子與中國文化觀察最深，他在其所著 *Our Oriental Heritage* 一書中說道：「中國歷史可以孔子學說影響來撰述。孔子著述，經過歷代流傳，成爲學校課本，所有兒童入學之後，都熟讀其書而領會之。此一古代聖哲之正道，幾乎滲透了全民族，……使中國文化之強固，歷經外力入侵而巍然不墜，且使入侵者依其自身影響而作改造。……即在今日，猶如往昔，欲療治任何民族因唯智教育以致道德墮落，個人及民族衰弱而產生的混亂，其有效之方法，殆無過於使全國青年接受孔子學說的薰陶。」這一段話，正給我以更大的鼓勵，在此時此地，來講述這一個題目。

一、孔子是人，不是神

人，是動物中最靈巧的。自從戰勝了毒蛇猛獸以後，曾有一度長時期崇拜力量，誰的力氣最大，誰就有資格做領袖。但是文明進，智識與道德終勝過了力量，這正是孫中山先生所發明的宇宙間進化原理。由第一時期的物質進化，經過第二時期的物種進化，再進入第三時期的人類進化，他說：在這一時期，人類不復如物種以生存競爭爲進化之原則（如達爾文所主張之進化論），而以互助爲進化之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孔子就是發揚人類進化原則最早的一個人，其一切著述均以道德仁義爲中心，以維護社會國家之秩序爲目的者，中山先生則繼承此一思想而發揚光大之。

孔子生在一個國家，其文明早已進化到不必再用神權來維繫社會的道德，所以在他的著述中，找不到神話。他自己絕不願提「怪力亂神」，他對於不知道的事物，亦不願說。他認爲「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他答弟子問生死與事鬼神時說：「未知生，焉知死」，又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上所引均自論語），因爲那時候，中國智識份子對於「神」字的基本觀念，認爲是一種尚未成熟的智識，所以在易經中就有「智以藏往，神以知來」的說法，後來孟子更爲「神」字下了一個定義說：「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換言之，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聖人尚且不

知道的乃是神，神既是一種尙未能知的事物，人爲追求知識，怎能對他怠慢而不敬，所以孔子告誡人說：「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由此而知中國人在二千四百餘年之前，已不大迷信。他們不因爲期望死後進天堂而始爲好人，亦不因爲懼怕入地獄而不做壞人，他們認爲自己既然是一个人，就得依照做人的正道而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同時亦應以人的道理去對人，這就是「仁」，所以說「仁者，人也。」故凡一個人能真誠爲人群幸福而創造而服務者，自然有受崇祀的資格，稱之謂神，亦無不可，所謂「至誠如神」（中庸）是也。例如中國木匠業在全國各地建廟崇祀的，爲發明能飛的木鳶的公輸子；水利工程人員所建廟崇祀的是平治洪水的大禹；藥業建廟崇祀的是嘗百草以療民族的神農氏。凡此，都是在某一專業方面有大發明或大貢獻，而其德行又是爲後世所矜式的祖先，爲對有姓有名的人之崇祀，無絲毫迷信之可言。在家祭祖亦然，故孔子說：「祭神如神在。」又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孔子爲一通才，被尊稱爲「至聖先師」，其一言一行，莫不可以垂範後世，其普遍地受人類崇祀，自然是應該的。

孔子在其著述中，亦時有提到「天」和上帝者，他有時亦作祈禱，但是他對於天的稱頌是「大」，是「高明」，而希望人能法天或配天；他對上帝是尊稱的，但他從來不以上帝爲萬能的主宰。因此孔子之教，就沒有帶宗教的色彩，而將人的地位看得很崇高，以「配天」爲人格的終極理想，所以後人讚譽孔子有一聯語曰：「德配天地」「道貫古今」，非常切合。

德國存在主義大師耶士培(Karl Jaspers)，在他所著的「大哲學家」(The Great Philosophers)一書中，他列舉蘇格拉底、釋迦牟尼、孔子及耶穌四人爲第一類標準人物，書中曾討論到何謂偉大，他認爲偉大必有事功的成就，事功有遠近大小可以計算，然而偉大不可以量計，凡與生存全體與宇宙全體與超越體相關聯的，乃得其所以偉大，偉大所在，即力之所在，然偉大不是力。充沛的生活力、創造的精神、宰制的理智，這三者皆屬於偉大，孔子似與上面所述者均相符合，宜其耶士培對其如此崇敬。

孟子對於孔子亦引一段極推崇的話而極合理的，他說：「麒麟之於

(9) 表師世萬爲稱尊被以何子孔：夫立陳

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這是說，孔子是人，但是他是人類中之出類拔萃者，自人類有歷史以來，未有能勝過孔子之偉大的，其盛譽可知矣。

但是一個神受人崇拜易，一個人受人崇拜難，其能獲得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人民繼續兩千多年的崇拜更難。不獨在本國而且在亞洲諸國如日本韓國越南等，亦均建廟春秋祭祀，這樣一件極不平凡的事，難道還不值得我們來仔細研究一下嗎？除非我們不承認自己是懂得科學的，科學是人類爲宇宙間的眞理求得答案，事實乃是科學的先決條件，亦就是他的憑藉，根據已有的事實去尋求原理，是科學家的責任，現在讓我們先看看孔子是怎樣一個人！

三、孔子的生平

一個極偉大的人物，他的生未必立了轟轟烈烈的事功，可能是很平凡地立德和立言，他在世時人們未必能發現他的偉大，及其死後，從其影響所及的範圍，廣大與久遠，才見出其偉大，孔子就是這樣一個平凡而偉大的人。

孔子名丘，字仲尼，於基督降生之前五五年生於中國魯國昌平鄉陬邑（即今之山東省曲阜縣），其父親名叔梁紇，爲陬邑大夫，武力絕倫，在當時以勇稱。孔子三歲時即喪父，家境窮困，由其母親顏氏撫養成人，未及十七歲，其母亦卒。兒時，孔子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年十九成婚，生一男二女。其私生活嚴謹有節，體格碩健高大。幼時即非常好學，十五歲時，乃志於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以爲進身謀生之途，是即所謂儒業。爲了早孤家貧，不得不急謀出仕，其開始爲委吏，即主管倉庫委積之職，後來改任乘田，即爲貴族家主管牛羊放牧蕃息之事，均能盡忠職守，有所表現。此類工作，當時社會方面視爲鄙事，故孔子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其妻宋弁官氏，婚後一年而生伯魚，由於孔子以熟諳禮樂聞名，魯昭公賜孔子以鯉，以賛其得子，榮君之貺，故名其子曰鯉而字伯魚。孔子年二十七左右，即入太廟充助祭之役。年三十學已有成，已能超越時代，會通古今之學，而能卓然自立，故自稱「三十而立」（論

語）。此後即在家授徒設教，同時研究周室風俗遺範，曾一度問禮於老子。年卅五，魯國大亂，魯君出奔於齊，孔子亦適齊。在齊與太師語樂，聞韶音而喜，專心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自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論語）。孔子在六藝教與學之中，於禮樂尤爲嗜好，因此，由藝見道，故同。他曾問官於鄭子，學琴於師襄，惟其爲學不厭，乃能誦人不倦，故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亦自謂：「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其學無止境，故能近乎智，「智者不惑」（論語），故及四十之年而自稱：「四十而不惑」（論語）。

孔子之時，周室中央名存實亡，天下分崩，諸侯割據稱雄，孔子雖存復興周室之宏願，無奈終未得見用。其時齊景公早已聞孔子之名，知其流寓齊，特予延見，並問以爲政之道。孔子知其弊，僅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字答之。景公雖悅其言而不能用，卒致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不久返魯，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來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孔子既施教有名，於政治言多中肯，故時人皆期其能出仕。

惟孔子認爲出仕旨在行道，若不能行道，無甯在家教學，庶能更了解天（環境）與命（趨勢），所行乃能免於大過，故自稱：「五十而知天命」（論語）。又曰：「加吾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孔子第二次出仕，年已逾五十。前後兩期教育生涯，共計近二十年，其弟子中著名者，有顏無繇、仲由、曾點、冉伯牛、閔損、冉求、仲弓、宰我、顏回、高柴、公西赤、曾晳、冉有、公西華、子貢、子路等，其中有年長於孔子者，有父子同學者，有出身於貴族者，亦有出身於平民者，計共有三千人之多。而其所採之方法爲啓發式的因材施教，並主有教無類之原則，故成爲一種新教育制度與方法。其學與教之內含，亦有別于當時一般士人之所爲學與所爲教，於是成爲中國歷史上特立新創的第一個以教育爲達成己成物的專業教育家。

在魯施教期間，孔子仍有若干次被邀出仕，終以權臣奪權爭利無能有所作爲，均設法辭却。及年五十一，自忖壯年期將過，若能有機會行道，不妨出而一試，遂接受魯定公之聘爲中都宰，不久升爲司空，復改任司寇。

次年孔子爲魯君相禮會齊侯於夾谷，以嚴正之辭，使齊侯不敢以兵犯魯侯，反以鄆謹龜陰之田來歸，其智勇可見。定公十二年，孔子又爲其陳墮三都之主張，事雖未成，而使齊國畏懼孔子之將使魯國強盛，遂選女子美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卅駟，以贈魯君，魯君聽季桓子之言而受之，遂迷於聲色，怠於政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此後孔子適衛，過匡過蒲（二地在晉衛兩國邊境），以貌似陽貨嘗被誤拘，後曾一度接受衛靈公之俸粟，旋見其無誠意任用之，遂去衛經曹適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而去。至陳遇絕糧，受困一時。魯哀公六年，孔子自陳至蔡，旋又返陳返衛，然後返魯。在外周遊凡十四年之久，孔子被魯人尊爲國老，季孫不得不於其返國時虛與委蛇，然終不敢用之。哀公有時雖亦問政於孔子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擧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又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此皆扼要之置答也。此時孔子已無意於政治，繼續完成其教育方面未竟之功。

孔子卒，年七十有三，葬於魯城北泗上，門人守墓三年始離去，子貢復獨守三年而後去，其尊師重道之精神，迄今猶爲中國之傳統。

綜觀孔子之一生，孤苦伶仃，未成年而父母雙亡。幼時即好學不厭，賴教書爲生而誨人不倦。爲生活計，下等工作，亦不得不嘗試。雖早有大志，終以理想過高，不顧隨俗浮沉，與時俯仰，在上者忌之，在下者畏之。周遊列國，艱險備嘗，所遇非人，有志未伸。立功既不可能，乃立德立言，以教後世，所謂在平凡中見其偉大者也。今以孟子之言（雖非爲孔子而發）以作結論：「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四、孔子與中國文化

中國有五千餘年之歷史，自孔子迄今，不到二千五百年，其以前之二千五百年中，有三分之一年代如伏羲、神農、黃帝等等，無詳盡可靠之記錄，不足以爲考，孔子言行謹嚴，必須文獻足徵，始爲撰述，故書經由堯舜記起，計時約一千七百餘年，孔子自謙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

語）者，亦即指此一時期中所遺留之文化遺產，加以整理，存善去惡，爲後世享用。有人謂「有孔子乃有中國文化」，此言似爲過譽，其實「有中國悠久崇高之文化，才產生孔子；有天縱聖哲之孔子，中國文化，才成其系統而見其偉大」。茲分別述其要點如下：

(1)集中華文化之大成

孔子將中華文化之重要典籍集中，分類整理，共成六經，分述如次：
 (甲)詩經——孔子將以往所存之詩，選擇其中最有意義者凡三百篇，稱之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言三者與德教不可分，而詩尤以人之內心情志爲本，有詩，乃能使人進入高雅美化中正和平之境界。詩有雅頌之別。頌者，天子用之郊廟，形容其祖先之盛德，即以歌頌其成功；雅者多半用之於朝廷，有大小之分，大雅所陳，其體近頌，遠自后稷古公，近至於文王受命，武王伐殷，西周遷迹，均詳於詩中之雅頌，尤勝於西周之書，至於小雅所陳，則以勞賞群臣，遣使睦鄰，秉鉞專征，飲宴賓客，亦均屬政治上事，故大雅與頌配之以樂，則爲天子之樂，小雅配之以樂，爲諸侯之樂，風詩鄉樂，則爲大夫之樂。詩既在會通人心情志，故曰：「詩以道志」，而以「溫柔敦厚」爲教旨。

(乙)書經——歷史可以使人鑑古知今，爲民族意識國家觀念之所自出。在以往一千七百餘年的光榮史實中，如堯之法天以成其大；禪讓與舜，以示大公；舜以大孝著稱；禹平洪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拜善言，惜寸陰；湯之日新又新；伊尹之訓太甲以政，終仍還政於太甲，無絲毫篡奪之心；文王視民如傷，樹立王政之楷模；武王不泄邇政事，夜以繼日，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忠勤民事，永垂人範。凡此僅舉肇始大者，使後世子孫，於國家生光榮愛護之感，於己身起頑廉孺立之志，故曰：「書以道事」而以「疏通知遠」爲教旨。
 (丙)禮記——天賦與生物以生存之本能，人類亦無例外。惟以生存資料之供應，未必能恰合其所需，則爭奪起矣，爭奪起，則強者優者勝而存，弱者劣者敗而亡，此乃達爾文進化論之原理也。惟「既欲其生，又欲其

死，是惑也」（論語），故人類有人類進化之原理，此即孫中山先生所稱之「互助」是也。惟如何乃能互助以達共生共存共進化之目的，則有類于「道德」，道德之見諸于日常生活者謂之「禮」，蓋在集體生活中，個人之動作云爲，須合乎一般之標準，然後能與衆人善於相處，集體才能井然有序。「禮」者，履也，理也，原爲不成文之法，筆記於書而稱禮記，其效實等於法。禮禁於未然之先，法施於已然之後，蓋法原於禮，禮原於德，而德原於道，故舍道德而言法治，是爲舍本逐末，「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孔子之教，以道德爲先，其重視「禮記」，自爲必然之結果。故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大學云「有德此有人」，推其意，亦可謂「禮者，不可須臾離也」，故禮記爲當時人人所遵守之法，具備動作云爲之標準者也。故曰「禮以道行」，而以「恭儉莊敬」爲教旨。

(1) 樂記一樂與禮爲德教之兩大基礎。禮，節文人之行動，見之於外；樂，和諧人之情緒，感之於內。前者如父親之嚴肅，後者如母親之慈祥。嚴，所以培養堅強之理智，慈，所以涵養豐富之情感，二者交相爲用，可以造成子女之完美人格。禮樂之作用，亦可造成一有生氣有秩序之社會與國家，例如國家有重大典禮時，必有樂隊爲之佐，再如軍隊中事重禮而亦不能離乎樂，其義易明。是故孔子首重正樂，正樂即所以正禮。並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貢並謂「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論語）。孔子之重視樂有如是者。「樂記」一書，苟非經秦火而散佚，必爲一完善之作品無疑，然其要點尚存，亦可見樂乃當時政治上大綱領所在。今人忽視之，靡靡之音，到處可聞，禮壞樂崩，重建匪易，是故個體缺乏內修，集體失其和諧，勢所然也。故曰「樂以道和，而以廣博易良」爲教旨。

(2) 易經一宇宙是無時無刻不在動不在變，生命者，爲一動變之過程（從存在以至不存在）。宇宙本身，及其所覆載之萬物，均各有其長短久暫不同之生命。每一生命之產生，必有其父（一）與母（一），其成長也，必有賴於天地之養育，以及物質與精神兩種原素之供應，其相對的兩方面，都可以（一）與（一）兩符號以代表之。在千變萬化（變易）之

中，尋求其不變（不易）之法則，使之簡易能明（簡易），以遂其生，更進而達優生、廣生、與長生，此爲易經之大要也。此書集四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智慧而成者，孔子繫傳，始將天道與人道相貫通，可稱爲自然法則與人文法則統一之學，博大精深，爲一極高明而不易了解之巨著也。簡言之，易經是使人知天（環境）命（趨勢），盡人力，以遂其生之學，爲中庸之道之來源，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者，即指此書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故曰：「易以道陰陽」，而以「潔靜精微」爲教旨。

(2) 春秋一凡人爲學之目的，在明是非，別善惡，辨順逆，知本末，識先後。孔子當時，已近周末，統一之局面已屆崩潰，一切優良制度，都已名存實亡，社會道德沒落，一片混亂現象，是非不明，善惡不分。孔子憂之，已雖有復興周室之宏願，終無實行其志之機會。諸侯互相爭戰，權臣專橫，君不君，臣不臣，社會風氣，唯利是圖，唯力是尚，倫理蕩然，不存，淫辭謬行，縱慾亂倫，到處皆是。一木焉能支大厦，其唯一可以警世者，莫如以最近三百四十餘年之史實，述之於書，予以褒貶，名曰「春秋」，以示善惡之兩面，期激發人們之良知，俾在正名守分的目標下，以啓發社會公是公非之重建。所以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故曰：「春秋以道名分」，而以「屬辭比事」爲教旨。

此六經者有哲學（易）有天文學（易與書）有史學（書與春秋）有社會學（禮與樂），有政治學（詩，書，春秋）有文學（詩與樂）有數學（易）等等，孔子集其大成，存善去惡，成民族統一之教材，其內容可以中庸之言以譽之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國人遂以「大成至聖先師」尊稱孔子。

(1) 宇宙是一「行」健不息時時在變（易）動的大生命，人不過是這一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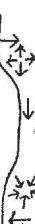
命中的一個小生命單位，其生存原理是相同的，其原動力亦是同一來源，稱之曰「誠」。天人合之理始於此，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

(2)「上下四方之謂宇」，是指三進向之空間；「往古來今之謂宙」，是指第四進向之時間，所以宇宙就是時空。在此時空中的萬有，莫不有其長短久暫不同之生命。生命的先決條件是質與能，由乾元（一陽）與坤元（一陰）二者之配合而形成其體；由時間（一與空間（一）之適應，以完成其用，（易稱陰陽時位）。前者以「致中和」爲歸；後者以「致中正」爲尚，二者均須時時調整以遂其生，故「中」之用大矣。

(3)在天，其表現爲「高明」而無所不覆；在地，其表現爲「博厚」而無所不載，以時空言則爲「悠久」與「無盡」，是爲「公」而無私，既大且久，生生不已的象徵。

四無數生命共同存在於宇宙之間，集體在動變，個體亦在動變，一經行動，勢必難免有所衝突。如何才能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必須各別自動調整，以達共生共存共進化之效。其互助之義曰「仁」，其調整之功曰「中」，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4)此種不斷調整（時中）之「行」動，有時須向上（以「火」有炎上↑之性作代表），有時須向下（以「水」有潤下↓之性作代表），有時須伸展（以「木」有向四方伸展→之性作代表），有時須收斂（以「金」有斂集←之性作代表），有時須中和（以「土」有平之性作代表）稱之曰五行（即五種基本動向）。合五者而言，則成爲正弦弧（Sine Curve）之波，



代表生命之過程及其種種變化。

(5)凡一切可以命名之事物，都是相對的，故均可以陰（一）陽（一）二符號代表之。例如：天地、剛柔、動靜、老少、質能等，二者雖有盈虛消長之變化，終屬相依而存在，如一方完全失去存在，則其相對之方面亦難單轉，就向了左，繼續不斷向東飛會飛往西去。所以說「物極必反」，「否

極泰來」，若欲求廣生與長生，須得無過亦無不及，而以「中庸」爲貴。

(6)相對的事物，雖云同時存在，然須有末末之分，先後之別。若本末倒置

，或先後錯亂，將有礙於生存。

(7)組成集體（多）的單位稱爲個體（一）。二者雖似相對，實爲具體而微大小不同的並存體，不容分立。所以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修身爲的齊家，齊家爲的治國，治國爲的平天下，故無（一）與（多）之爭論。

(8)由太極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是說明宇宙間一切事物在生命過程中，由簡而繁所經之各種可能的變化情況，而示人以應變之方針。

②人法宇宙真理以成道統

由於以上之認識，人類爲生存計，須得配合天地生生之德，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仁」，奠定共生共存之倫理基礎，並發揮其天賦的生存原動力之「誠」，以達成己（格致誠正以修身）成物（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而以無過無不及之「中」，以個整其「行」動，使之恰到好處，各遂其生。誠、仁、中、行，遂成爲人類效法宇宙之生存原理，以達共生共存共進化之目的。

堯法天以成其大，而以「允執厥「中」」傳諸舜；舜以大孝著稱，而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仁），惟精惟一（誠），允執厥中（中）」，傳諸禹；禹以至誠（誠）不息公而忘私之精神，平治洪水，使民安居；湯（中執中）；文武施仁（仁）政於民，以示範於後世；周公爲文武全才，外膺夷狄，內修禮樂（德），爲國家奠統一之基業；及孔子而集吾國文化之大成，以誠、仁、中、行，爲立教之中心，成爲數千年來吾民族之道統，並形成大剛中正之民族特性。亦即中山先生所欲繼續發揚之歷聖所遺傳下來的正統精神。

因此吾人可以了解所謂道統者，就是將人類生存之大道（原理）流傳下來，爲子子孫孫所遵守，孔子與國父均爲闡揚此一道統的時代繼承者。我們才知道中國文化何以能一脈相傳，而其他文化則中途而斷，是因爲中國文化乃代表人類生存之眞理，祇要人類不斷地要求生存，則中國文化亦

能永久生存。吾民族珍視此一道統，使之發揚光大。政統可斷，而道統絕不可斷。咸認爲有道德者始有資格作統治者，無道德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人人得而去除之。士君子是以衛道爲天職，以身行道，爲民表率，故其地位極爲崇高，雖貴爲天子，亦必尊重士之人格，師之友之。惟其如此，民族有其靈魂，國家有其綱紀，社會有其秩序，蓋法原本於禮，禮本於德，德本於道，道統之重要，蓋可知矣。

誠、仁、中、行，既爲民族之道統，其對於民族文化之影響，自屬深遠。言其特質，有如下述：

1 天道人道合德，同源於「誠」；一天人合一。

2 成己成物並重，歸於求「仁」；一內聖外王。

3 先本後末母誤，執兩用「中」；一本末有序。

4 博學審問思辨，尤貴篤「行」，一知行並重。

集體與個體，自均以配合道統爲主，於個人言，亦以「誠」以律己，「仁」以待人，「中」以處事，「行」以成物，爲樹立人格之條件，庶能合乎共生共存共進化之互助條件也。

孔子既創見宇宙生存之眞理，復效法此眞理以成民族之道統，使此一民族具有五千年之悠久歷史文化，並擁有七億餘之人口，其極大部份在亞洲，少數散播在全世界各地，不但自己能和善相處成爲一家，而且能適應任何環境與其他民族和諧相處。她自己沒有具有形式及組織的宗教，而能具有高尚的道德，且能包容外來的各種宗教，使之並存不悖；她能使侵略她的民族同化，而最後成爲融合無間的一家人，例如蒙古滿洲等民族是也；她能使不易受人同化的民族全部放棄她們自己的習慣傳統，而甘爲中華民族之一部份，例如河南開封城郊外移來之猶太民族是也；她認爲唯有道德始能強扶弱，智益愚，富濟貧，使不平漸趨于平；她認爲武力不足以服衆，自難持久，故不可取，是以崇尚以德行仁之王道而貶以力假仁之霸道；她相信金錢雖爲人生所必需，惟爲末而非爲本，惟道德才可稱爲本，故有德本財末之信念；她相信國家民族的基本組織是家庭，絕對不可任其破壞，淫慾是破壞家庭的基本因素，故稱「萬惡淫爲首」而摒棄之，以孝弟爲齊家之要道而崇尚之；她相信樹人爲萬事之先決條件，不可絲毫疏忽，

故以修身爲人人之天職。凡此均爲衆所周知之事實，固無一而非從道統而產生，爲每一研究中國文化者所應首先了解者也。

由此而知毛共之一切作爲，僞而不誠，暴而不仁，偏而不中，鬥而悖行，完全與中國之文化精神相違背，絕不能爲中國人民所接受，其失敗必矣。其所以必欲批孔與消滅中國文化者，是自知不容于中國，不得不採窮途末路之步驟，以求苟延殘喘，至爲明顯。殊不知中國文化之道統，爲人類生存進化之原理，不可毀也。毀之者，自毀而已。

(3) 闡發人理之精義

吾人若將孔子之思想加以分析，來給他一個適當的名詞，則可稱之爲「人理學」，因爲他所着重研究的對象全都是人，即使研究天道亦是爲的是人道，所以說：「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中庸），其內容包括下列若干問題：（一）怎樣才算是人，其所以不同于禽獸者是什麼？（二）人性是什麼？怎樣率性、忍性、與盡性？（三）人在天地間的地位是怎樣？人怎樣法天與配天？（四）人與人間的關係怎樣分類與維繫（倫理）？（五）造成自己的條件是什麼（成己）？（六）人的責任是什麼（成物）？（七）人的分類（如君子、小人、聖賢等）以什麼爲標準？（八）集體生存的條件與原理是什麼？（九）個體生存的條件是什麼？（十）怎樣來認識人？（十一）怎樣來樹人？（十二）怎樣才是做人的正道？（十三）人性的動能是什麼，其源泉何來？（十四）人與人間的凝結力又是什麼，怎樣發皇？（十五）怎樣達致優生、廣生、與長生？（十六）其他。

以上若干問題，我在編著「四書道貫」及「人理學研究」兩書時，已全部得到了答案。所以我在結論中說：「孔子之教，爲人生日常生活所遇諸問題之解答，以及人與人間正常關係之闡明，合理（中）而平凡（庸），爲人人所易知易行者，簡言之『合乎人情』而已。是以其道用之于身則修，於家則齊，於國則治，於天下則平。」若再以孔子之教比諸于老子之教，則孔子比老子更切實際，所謂卑之無甚高論，惟其平庸，更易普遍地爲人接受，其成爲中國文化思想之主流者在此，以兩千數百年以前的一個人，竟能夠替我們解答今天的實際問題，這不是「聖之時者」而何？若非精通「人理」，其能若此何？

(4) 貫定平民教育制之基礎

孔子既爲中國編述統一教材（六經），又爲民族建立久遠之道統，並採德智兼修文武合一之六藝教育，其聲譽自然遐邇聞知，生徒來自各國受教者前後達三千餘人，其中精通六藝者有七十，以當時情形而言，可謂難能可貴之成就。

孔子之門徒後來散居各國，任重要政治或教育工作者頗不乏人，其思想之影響于政治及教育，自爲必然之結果，平民教育制之風行當由此始。此後秦始皇焚書坑儒，顯然畏懼人民教育之普及，有礙于其暴政之推行，今毛共欲法之而不敢，而以揚秦爲歷史翻案，而欲爲亡秦之續，其愚眞不可及。兩千四百餘年來，雖暴君迭起，亦無一敢以命令取消此平民教育之制，孔子之功也。其後考試制之採行，亦以鼓勵人民設教與自修，不論智愚貴賤，均可入試，一經錄取，即可出仕，以身行道。既無階級之分，又無門戶之別，平等思想，由教育而及于其他方面，至爲普遍。中國以往向爲歐洲各國譽爲禮教或道德之邦，苟非教育普及，曷克臻此？孔子對於教育文化之貢獻如此之大，宜其足以爲人師法，爲世表率，而被尊稱爲「萬世師表」而無愧。

五、孔子對於教與學之指示

吾人雖尊稱孔子爲「萬世師表」，但是孔子教人要謙讓，不應自己好爲人師，因爲一經自大，學問不易再進步矣。他說：「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論語），當時人家稱他爲聖人，他又自謙地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論語），又說：「吾學不厭，而教不倦焉」（論語）。他對於「教」有如下之指示：

(1) 有教無類——他認爲人人有受教育的平等機會，無論貧富、智愚、貴族平民，祇要他有志于學，都應該教他，無力繳足學費，亦無妨。所以他說「有教無類」（論語），又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也」（論語）。

(2) 倡道之謂教——他確定教育之第一目的是教人做人，換言之，使人能和他上下左右前後的人能和善相處，然後人與人間之路（道）可以修通。所以「道」之意義，是人際間之大路，而如何行此大路即是「德」。達

道有五，君與臣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兄姊與弟妹之間，夫與婦之間，朋友與朋友之間是也。達德有三，智、仁、勇，是也。惟三者以「仁」爲中心，故曰：「修道以仁，仁者人也」，所以教育之目的在修道，在明德，在行仁，在教人如何做人。

(3) 仁爲教之中心，孝弟又爲仁之本——孔子之教，首重本末先後，本末不容倒置，先後不容錯亂，所以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大學）仁即愛人，亦即人類進化之原則——互助是也。其實踐之始基，應在家庭中父子兄弟之間，庶能由小而大，由近及遠，舍親親而言仁民愛物，是舍本而逐末。所以論語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4) 以德智兼修文武合一之六藝爲教——禮、樂、射、御、書、數，稱爲六藝，禮與樂即今之德育與群育，前章已詳言之，不贅述；射與御，平時用以健身，戰時即可用以衛國，昔時用于弓矢車馬，今則用于大砲飛機，其爲射御則一，亦即今之體育與軍訓；書與數，爲一切學問之基礎，前者用以說理，後者用以計算，二者俱精，何學不成？亦即今之智育是也。六藝俱全，則德智體群諸育齊備，教育之功能見矣。

(5) 立志爲立教之前提——孔子說：「士尚志」，人生必須有一目標，然後依目標方向前進，方易有成。大學知止章：「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亦即說明有志竟成之意。孔子對于弟子，欲各人述其志願，而分別予以指示，其重視立志可知。又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孔子重視詩，亦以「詩以道志」，故曰「興于詩」。

(6) 採因材施教之方式——孔子認爲「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其他均可以教育陶冶其德性，故同一問題，其所答者不同。須視其才智之高下，性格之敏鈍，而補其所不足，在論語中數見不鮮，他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又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7) 採啓發的教學方式——孔子對於學與問同時並重，他常鼓勵

弟子發問，論語中答弟子問者最多，他主張「博學」，同時亦主張「審問」

，他讚美舜好問，而對於最好學最聰明的弟子顏淵不違如愚，引爲憾事。

他鼓勵人「不耻下問」，（論語）並且說「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能問乃能解惑，不惑庶可稱爲智者，故曰：「智者不惑」。（論語）

(8) 身教重于言教——孔子認爲「有德者必有言」（論語），又說：「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大學）。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

(9) 成己先于成物——有體乃能有用。成物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惟有先脩其身（成己），使之具備成物之能力與條件，始克有成。而成己之先決，爲格物致知以成智，誠意正心以成德，德智兼備，脩乃成，是爲務本。

(10) 教者應有個人之理想標準——教者非以灌注人以智識爲務，應有一較高的理想標準，庶幾取法乎上而僅得其中。其最高標準爲聖賢，普通標準爲君子。孔子對于君子與小人之分別，有詳盡之研究。例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等。至于聖人，則當然具備君子所具備之條件而勝之，而爲「至誠盡性之人，故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中庸）且能「大而化之」。（孟子）故能爲百世之師，「生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焉。」（孟子）至于可稱爲至聖如孔子者，則必須具備下列之條件：「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有此理想標準，樹人庶有所本。

孔子對於「學」亦有如下之指示：

(1) 學，應從規矩學起——幼而學，壯而行，習慣成自然，洒掃應對進退之種種規矩，爲日常生活所必需，亦即是禮之入門，人之文野，由

此別之，所以孟子說：「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2) 學，不患無師——凡人所見所聞，無一不是學問，祇要自己時時向上向善，學問自能日進。孔子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又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所以不僅善者賢者，可供借鏡；不善不賢者，亦可供警惕，均屬於學之對象。

(3) 學，在愛好而時習之，不厭其多——學問愈進愈感不足，已知者毋忘，未知者追求，時習而不厭。所以孔子說：「吾學不厭而教不倦焉」「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與。」（以上均出論語）

(4) 學，貴能思辨——學問雖博，而不加思考，猶似飲食不能消化，有害無益。所以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說：「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以上均出論語）

(5) 學，所以成智與明德——「好學近乎智」（中庸）其理易明，惟致智之目的在于誠意正心，乃屬於德之範圍，二者固互爲因果也。所以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中庸）成智明德，旨在修身也。

(6) 學貴能行——學貴能博，問貴能審，思貴能慎，辨貴能明，惟最後在于行貴能篤。故孔子主張「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論語）士人爲學，旨在行道，非爲一己之衣食富貴謀，孔子屢言之矣。

(7) 學，固爲成己，尤重成物——學爲修身，旨在成己。成己絕非最後目的，蓋獨善其身，不得已也，兼善天下，始爲士人之所期。故常以天下爲己任，由齊家而治國，由治國而平天下，認爲人生之責任也。孔子以此爲教，即大學之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也，而其要在於誠。

(8) 學宜致廣大而盡精微——學宜廣博，則見遠而量宏，惟亦不宜忽於精微，否則流於淺薄。所以學問貴乎慎思明辨，以求精微處亦無不到。所以中庸有云：「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9) 學，貴能時中——時中者，時時能恰到好處，換言之，一切言

行無過亦無不及，此則在乎判斷之正確，故能發而皆中節，惟學乃能之。

(1) 學無止境，一生宜樂之不厭——孔子自承認爲最好學者，惟其真好學，乃能樂其所學，不厭不倦。所以他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也，不如丘之好學也。」又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以上均出論語）。

由於以上教與學之各項指示，可見孔子確爲教育大家。凡所言者，莫不爲教育上之重要原則，雖在今世，無不適用。真理固無古今中外之分也。

惟孔子在整理中國文化典籍時，對於周代以往六百年之統一盛業，追慕不曰，故一則曰：「余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再則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三則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均出論語）蓋時代由盛而衰，常感今不如古，非復古也，鑑往以知來也。積累之智，備于六經，實爲最科學最寶貴之教與學之材料也。

六、孔子之教與人類幸福

孔子豈止「前無古人」之教育大家，其所垂訓，實與全人類幸福攸關，茲擇要述之如下：

(1) 孔子認定人類的一切幸福，必須從「公」與「平」二字中求之，惟有道德才有力量達成此一目的。所以他對於道德，認爲是人生第一要務。他說：「有德此有人。」（大學）又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中庸）甚至說：「朝聞道，夕死可已。」他視道德比生命還重要，因爲有了他，人類共生共存，才有保障。因爲「志私心存公道」，是道德的基本精神，「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之宏度，出諸于道德。有了他，才能富濟貧，強扶弱，智益愚，使不平能趨于平。今日世界之兩大思潮，資本主義是「重財而輕德」，共產主義是「重物而輕人」，人爲財奴，人爲物役，而不自知。宗教非但不能得物質科學進步之益，反而蒙其害，於是以宗教爲憑藉之社會道德，日益墮落，殊堪憂慮。不如孔子之「重德兼重人」之教，反能激發人類之自律，而爲今日濟世之良藥。

(2) 孔子最重視本末先後之道，先本後末，不容倒置。他認爲無論天下或國或家，都是集人而成的，人不像人，如何能有好的家，好的國與

好的天下？所以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學）又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大學）此言人無貴賤老少智愚賢不肖，皆得修身；個體個健全，則集體未有不健全者。此種務本的精神，實合乎科學的方法。今日西方世界，日趨于個人享樂主義，重財輕德，重物輕人，少年犯罪與日俱增，人不重德，家不成家，國不成國，而期人類之幸福來臨，不亦舍本而逐末乎！

(3) 倘身既爲人人之天職，則如何才能脩身？孔子說：「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所謂道者，即人際間之路，宜求其通達無阻，約言之，達道有五，前已述之，而如何以行其路，謂之德，即智、仁、勇三者是也。三者又以仁爲中心，智所以知仁，勇所以行仁，此人與人之正常關係，每一條路，有其稱謂，即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順，朋友信義是也。換言之，即爲倫理，或稱五倫。此一倫理之建立，所以別人類于禽獸，爲孔子對人類之最大貢獻，而進人類于文明之域也。由此則每人自知如何盡爲人之責，定位守分，以建社會之秩序也。試現今日之世界，人倫之敬與愛，日見微薄，父子兄弟之間，不若以前之親愛，夫婦之間可以分離，君臣關係僅憑法律之維繫，鮮有仁敬，朋友之間利害重于信義，倫理日喪，人類進化之原則不存，其能不回歸至獸化，不得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倫理、民主、科學三者爲綱，而首重倫理者，蓋欲自救，兼以救人。深知孔子倫理之教，爲今日全人類所亟需耳。

(4) 孔子既以仁爲人道之中心，發展而成倫理之基礎，前節已言之矣，惟如何乃能合乎仁？仁字從「二」從「人」，其義是以「人」之道待人，自能合乎仁。孔子因此又發明仁之校核方法，稱之謂「絜矩之道」，其言曰：「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此之謂絜矩之道。」（大學）簡言之，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蓋凡事如能先作設身處地之想，即能以「人」之道待人，自能公而

無私，平而無傾，講信修睦，則天下平矣。今日之世界，強人從我，損人利己，視爲當然，「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衆也」（孟子）。日日播惡而求善果，不可能也。孔子之道，其應興起乎！

(5) 「財」爲人生之物質條件，不可或缺，惟孔子認定人生之精神條件「德」，其重要遠勝于財。故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大學）。本末不容倒置，否則三尺之童，惟財是務，人與人間之情愛勢必日減，危機深伏，不可挽救。今日西方社會，以工商爲重心，政府要員亦遴選自工商界，其重財，勢所必然。于己有利時，雖資敵以糧，亦可爲之；犧牲原則，亦所不惜。孔子認爲：「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在今日隨時可以見證。故欲以工商爲重心之立國情形下，謀世界之和平難矣。此則可供研究國際問題者之參考也。

(6) 「力」爲國家對內對外不可或缺之事，但祇能有備而不用，不宜對內用以壓迫人民，剝奪其自由，更不宜對外用以侵略弱小民族，如共產政權之所施。孔子崇王道而貶霸道者，以其不易持久故也。王道以德行仁，使民心悅服；霸道以力假仁，使民畏威而懾服，自動與被動之不同也。爲國者，其可不作久遠之謀乎？達爾文之進化論主弱肉強食，馬克斯之進化觀，亦採以暴易暴之手段，二者均憑力而不憑德。殊不知世界上最大力量，莫過于道德。原子武器之不敢輕用，德使之然也。人類如欲繼續生存，則王道終必勝霸道，可以預卜也。

(7) 孔子另有一極大之發明，謂之曰：「中庸之道」。人類之智識愈增進，其對於事物之兩極觀察愈清，始能了解事事物物在時時動變之中，走極端爲錯誤，而有一恰到好處之因應，稱之曰：「中庸」。中庸之道，適用於空間最廣時間最久，自爲合於人群大多數之極長期之需要，與民主制度之精神相吻合。中國人崇尚此道，故雖未行民主制度，而民主精神則深植于民間。今日西方國家之行民主制度已久，惟此一良制，漸漸落入有錢者之手，流弊滋長，殊可惜也。苟能配合中國之考試制度而研究之，此一良制，庶可得其利而免其害，可供研究政治制度者之參考也。

總之，孔子之道，時雖久遠，而對於今世之時弊，似有不少之救濟良

藥。其效在其道合乎人情，適乎天性，順天應人，可供人類生存進化之所需，故略舉數端，藉供參考焉。

七、孔子之教與世界和平

人類幸福，前章已言之矣，惟和平與幸福實爲一元之兩面。和者，Harmayn 也；平者，Equality 也。有階級，必不平；有鬥爭，必不和。故共產主義之階級鬥爭，和平之大敵也；資本主義，使貧富懸殊，不平等，商業尚競爭予外，其實鬥爭于內也，故亦不能以和平期之也。孔子認爲治國平天下，應源于「誠」，而以九經爲教如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

一者何，曰「誠」是也。觀此九經之程序，仍以由修身（一經）做起，進而齊家（三經），而治國（二、四、五、六、七經），而平天下（八、九經），本末先後，井然有序，要皆以和諧公平之精神，處理國事與天下事。而其原動力，仍爲「誠」。誠爲智慧，爲仁愛，爲力量，爲信仰，

爲物之終始，爲真實，爲偉大，爲正義，能盡性，能及遠，中庸中有詳細說明，喻之西方之上帝，同義而異名，「誠」實爲世界和平之先決條件。

孔子對於世界，更有「最高之理想，稱之曰「大同」，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焉，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焉，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篇）

由此而知，天下事物無二者全相同者，存小異而求大同，乃合乎天理而得和諧，強不同而使之同，如共產主義者之所爲，是自私，是愚蠢，不可以爲訓也。故「天下爲公」，爲大道之行之先決條件，察全文之內容，幾無一事不表示至公無私。在今日世界中，人力資源發生問題，均由私與不平而起，觀於二千四百餘年前，孔子之大同思想，已對此兩大問題，提示解決之原則，吾人其能不汗顏乎！中國政府，曾以孫中山先生所著之大

同章文字，鐫之于大理石，禮贈聯合國，中共進入聯合國後強迫取下，而聯合國秘書長竟爲之屈服，此一世界組織，竟無一人敢以正義抗拒之，其尙能爲「公」與「平」之保障乎！其崩潰可計日而待焉。

總之「不誠無物」，「不平則鳴」，「不公則傾」，世界和平，不能由此得之也。

八、孔子思想對世界所發生之影響

孔子思想對世界各國學者發生影響，既深且鉅，誠屬當然，我會研究西方學者及哲人關於孔子之著作，將所獲結果撰成「孔子學說對世界之影響」一書，分上下兩輯，在第一輯中曾列舉西方各國原始材料，並引述若干中國學者如錢穆、林語堂、張其昀、吳康等所知孔子思想對西方之影響，在第二輯中則引述亞洲各國學者對孔子之敬仰，及孔子思想在各該國家及其文化之深遠影響，此書於一九七一年由台北復興書局刊行，紐約華美日報亦代爲經售。

西方學者關於孔子學說之研究，可包括於下：(1)翻譯孔子著作及經典；(2)關於孔子傳記之撰述；(3)關於孔子學說及貢獻之評述；及(4)關於孔子與世界其他哲學家之比較研究。

即就上述各種研究及著作而言，已浩如煙海，不能詳舉。蓋此項研究屬於專家從事有關孔子之範圍，至于對一般學者及智識份子有提及孔子者，則無庸過事涉獵也。

據我所知，關於孔子經典，已有多種外文翻譯，包括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及西班牙文。當然，在亞洲各國中，早已譯成名該國文字，孔子所受之敬仰，亦與在中國所受者無分軒輊，西方學者關於孔子傳記之書籍，亦有多種，其作者包括英、美、法、德、意、俄諸國，其中最早之傳記，爲一意國學者所作，於六九二年印行，據我所知或所讀已有廿餘種，至今當不止此數。

西方研究儒家哲學之學者，曾撰述、闡釋、分析及綜合孔子學說及思想，我會涉獵此類著作廿五種之多，其最早者於一六八八年出版，亦有六〇年代及七〇年代之新著。

就世界哲學家中作比較研究，則舉世曰「公認孔子爲東方智慧及學說之最高代表」。法國學者巴斯托雷德（Pastorat）曾于 1887 年著「在羅斯德（Zoroostre），孔子及摩哈默德三聖論」；英人約瑟愛德興斯（Joseph Edkins）亦于一八五九年著有「中國宗教論」比較論述孔、道（老子）、及佛教；西方學者較著名且爲人所熟知者，則爲詹姆斯雷格（James Legge）所著之「基督教與儒家哲學」，此書於 1880 年發行。當然其他著述尚多，不勝枚舉。

在講演結束時，如時間許可，當將研究孔子學說及傳記書籍目錄，介紹若干種，藉供參考。

孔子在日本所受之敬仰，不亞于中國，日本學者大都能閱讀中文，無需重譯，故對於孔子之了解，自較深且廣，其著名漢學家兒島獻吉郎著有「諸子百家考」，稱讚孔子，無微不至，書中有云：「孔子者，偉人中之偉人，聖人中之聖人也。……孔子生于東洋亦爲東洋全體之榮譽……若不贊美孔子之盛德，反毀損孔子之令名，則非但傷中國一國之名譽，併損東洋全體之名譽矣。」另一日本學者高山林次郎（樗牛）則尊崇孔子、釋迦、蘇格拉底及康德爲世界四大哲人。

茲就孔子學說對歐洲學術界及社會之影響，略加敘述如下：

(1) 毫無疑問，孔子思想對於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中葉之法國智識界，曾有極深刻之影響，法國學者賓諾（Virgile Pinot）曾于一九三一年撰著博士論文，題爲「中國對法國 1640~1740 年代哲學精神形成之影響」（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on France 1640~1740），書中會研討歐洲派遣耶穌會修士赴中國學習中國哲學及史實，此等修士對於法國哲學之形態及精神，作了鉅大貢獻。賓諾書中併提出若干歐洲學者關於中國材料之研究，足供參考。

(2)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爲第一位認識中國文化對西方國家發展具有最大貢獻者，他認爲宇宙觀念在易經中所提出者，與他所認識的現實世界完全吻合。一切生命都在這裏面不斷地成長前進，他重視道德，認爲是快樂的源泉，更與孔

子的「樂道」精神不謀而合，他併建議西歐國家及蘇俄均應開放門戶接受中國文化，並進行文化交流。

早在一六九七年萊布尼茲在他「最新中國消息」*Novissima Dinaica*一文中，即已建議歐洲學者應注意關於智識氣氛中每一新潮，彼認為歐洲在科學及哲學方面，雖較中國優越，但對於孔子的人生哲學及政治觀念，則極為服膺。他說：「有誰知道在彼方（指亞洲）有一個民族，其平民主活原理，較吾人所有者確勝一籌。但在中國人的倫理及政治中，吾人可以經驗到此項事實，在中國人的法律中，一切都美麗的描述清楚，並遠較其他民族為優，此項法律的目的，厥在維持一個安定的社會。」

萊氏倡導東西文化交流厥功甚偉，德人法蘭克（A. H. Francke）在一七〇七年成立了所學院名為（Collegii Orientalis Theologie），招收傳教士為學生，學習中國文化，該院畢業生流佈在德、俄、英、法等國，推行中國文化及哲學，不遺餘力。德國詩人歌德（Goethe）亦開始對於中文及中國詩發生極大興趣。因此奠定了德國成為歐洲研究漢學中心的基礎。

孔子思想對於法國發生極大的影響，係在法國大哲學家及辭典撰作有福祿特爾（Voltaire）的年代，此一時代即史家所盛稱之啓蒙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福氏極崇佩孔子，熱愛中國文化，在他的大著*Essai Sur les Mones*中，他用了三大章篇幅討論中國文化，福氏並在他的「哲學大辭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中盛讚中國為「世界上第一個最古老、最廣闊、最人多、最治理得法的國家」。

故杜朗（Durant）所述，福氏，如其他法國哲學家及德國哲學家爾夫（Wolff）一樣，曾以神明地位，看待孔子，蓋因孔子「遠在基督教成立前五世紀，即以道德原理教育中國民族也」。事實上歐洲人士早已發現孔子為一自由思想家，並且發明不賴宗教而可以維持人類道德及倫理觀念，並用之於實踐方面。

以上所舉數例，僅說明過去的情形，如果西方人能放棄自大觀念的成見，能多向中國尋找現實問題的妥善答案，則孔子的悠遠成熟的人文主義

，一定可無條件的儘量貢獻走向和平幸福的途徑前進。

九、結論

以上八章所引十之九為孔子之言，其餘亦都出之于六經四書，可見孔子之教，無不以人類幸福與世界和平為主旨，惟有真正愛人類之人，才能得到人類之愛敬，此可為證。孔子學不厭教不倦之精神，可為世上任何一教師之模範，中國人于各種方面久受其惠，不敢自私，故特于此時此地，述其大要，俾美國今日對中國文化逐漸感到興趣之際，對於可為「萬世師表」之孔子，更多了解，則幸甚矣。

國父思想與傳統道德

——人文文庫一九五二—五三——

田立樺著 定價一八元

由於近百年間，世界風雲急劇變動，我國安定之社會及傳統道德，於列強之侵略及共匪蠱惑下，破壞無遺。今日青年或竟不知我倫理思想為何物，或譏為腐朽之常談。我國歷代相傳之道統，經我國父三民主義之發明，得又一次充實，且集光輝之大成。不惟無人能予以動搖摧毀，亦且愈經搖撼，愈見其剛健久大。作者爰將我國倫理道德之演進及國父倫理思想之主張分析闡述，明其演變，知其卓絕，於景慕仰止之中，樹立崇高理想，偉大抱負，庶能身體力行，以挽狂瀾云耳。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